

论居缘作为未来社区生存的内在维系

王列生

摘要:继社会治理社区化和扁平化迅速推进后,智能社会给每一个智能社区带来的栖居方式加速变迁,在实体社区、虚拟社区和线上线下融合社区等不同日常生活界面,都将呈现生存突变趋势。其核心突变之一,就是传统“固定相邻”很快被“随机择邻”所置换,而这种置换的内在维系,是人们自觉地走向居缘诉求或者居缘文化诉求,以适应流动生活、流动社会和流动价值追求的需要。于是既有的邻里关系日常状态,也就在更高的价值互约中实现生存转型。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穷尽未来转型的边际义项,但可以肯定的是,那将是社会变迁的革命性转折、人际栖居关系的革命性转折、日常社会生活方式的革命性转折,因而各种正向量价值预期皆有可能。

关键词:居缘;居缘文化;社区形态变迁;大数据支撑;智能社区预期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1.05.004

通常我们讨论社区文化治理,无论学理分析还是实践靶向定位,基本立足于当下在场经验,或者以某些先行社区文化治理国家的成败得失作为中国问题延伸的价值参照,由此形成分层、多维或者异类研究的知识成果。毫无疑问,所有这些成果在被证伪抑或文字游戏定位的求真状态下,对社区文化治理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决策都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和价值。但如果我们给予进一步的追问,就不难发现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事实,那就是此前直接经验的社区或者间接经验的社区,在可预见的未来甚至不可预见的未来,还会以现存方式确立其存在状态、功能指向与栖居方式吗?换句话说,除了线上虚拟社区作为随机生存共同体的实存形式,几乎所有方面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不知何往的一片空白之外,线下实体社区作为暂且具有一定程度超稳定性邻里关系的日常生活共同体,在未来社会转型尤其个体生存间性加速产生增量的情势下,世界之为世界或者在世之能在世,于整个社会当然也于无数具体社区,就一定还处在此时的经验阈限之内吗?显然不是。随机性将成为社会生存活性,一切超稳生存状态将因这样的活性而随机有效嵌位,甚至能借助人工智能嵌位出生存效率几何增量的人类算法社会与人群算法社区,其直接后果不是人的失率紊乱而是秩序化自由。但这带来的新问题就是,获得随机秩序化自由并且社会和社区都呈现日常生活流动化的人们,将如何在动态与静态高度统一中寻求人性化的人世间,并且能在这样的人世间享有诸如人格尊严抑或幸福快乐的主体体验最大化与客体支撑最优化。仅就社区存身而言,我们现在的研究结论,乃是居缘文化成为社区生存论知识属性,而且也可能是生存论界面未来解困的预期知识方案。

一、居缘的命题语指

作为知识命题,居缘文化是未来社区生存维系的指向要义在于,无论虚拟社区空间还是实在社区空间,由于居民身份不再以社区认同作为其存身必然条件,随机进入特定社区空间的居民虽然居住时间长短不一,因而非稳条件确立起的暂稳边际共同体,个体要想在这一共同体的自我时空嵌位过程中,最大程度地珍惜和尊重其自我选择的居住本身,并因这种珍惜和尊重而与其他居住者建立人性最

作者简介:王列生,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武汉 430072; ggwhzc@163.com)。

大化的生存协同关系或者相依为命的积极主动日常氛围,就必须促使居住成为社区进入者之间彼此珍重的缘分,居缘文化由此成为所有社区的日常文化活动和日常栖居过程的内在维系。事态一旦至此,居住和居住文化体现至何种缘聚程度,则社区生存质量与社区文化能量就同步体现至何种发展程度。

如果对这一命题给予更加清晰的语义梳理,则可以义项分述为:(1)“居缘”是居民个体存身机会选择的自我肯定。(2)“居缘”是居民之间日常生活追求的彼此互约。(3)“居缘”是居民群体命运与共的一致目标。

当职业、户籍、房契等生存要素丧失其超稳存在属性之后,个体社会生存选择的任意项与具体选项,都不不具有个体主体性乃至主体自由性的合法化权利,而在特定时域选择何种社区作为栖身之所,当然就是诸多权项中的重要一项,且必然处在日常生存权利清单中的凸显位置。但这还不够,更为充分的表述在于,每一次选择权利实施同时也就意味着一个选择机会实施,因为权利和机会此时对任何个体而言,其可选择性均为个体与社会互相选择的博弈后果。既非社会福利无条件恩赐,更非个体非理性随心所欲,从而也就意味着选择对个体生存而言,于边际条件下具有行为正确的决定性地位。无论达尔文基于自然适者生存的物种起源观^①,还是斐迪南·滕尼斯基于共同体抉择意志驱动功能的社会构成论^②;无论社会知识域安德鲁·芬伯格讨论“可选择的现代性”时所谓“一种思考可选择现代性的模式。日本是一个好的案例,因为它把一种完全外来的文化与一种非常熟悉的技术和体制框架结合了起来”^③,还是经济学知识域布莱恩·罗斯比讨论“经济选择过程”时所谓“与其求助于语焉不详的自然选择论(有意识的理性在这里被排除了),并试图对假定了超级人类理性和明显地具有上帝般无所不知的模型的使用加以证明,我们为什么不去发展一种将理智的选择(reasoned choices)纳入其中的经济演化理论呢”^④,诸如此类,都无不是把“选择”放在杠杆性的功能位置,而这就意味着在居民对社区的选择过程中同样存在这样的杠杆性,因为这一过程就其行为本质而言与其他过程具有本存一致性,只不过方式与际遇有所区别而已。

事实上,对居住的选择从人类社会发端就已同步发生,所不同的是,愈是社会生存面延展或者生存代际变化,这种选择的主体间性、社会普遍性和行为目的性就愈加凸显,或者说,未来对社区的选择将不是每一事态介入个体都具有“孟母择邻”的生存指向,而且一旦“择邻”成为事实,彼此或者群体之间都将比现在具有质性飞跃意义地尊重自身及他者的选择,由此将会在社区边际内共同将“机会”转换为“机缘”,在偶然性行为过程中寻求必然性行为结果,而这显然与今天基于静态邻里关系结构诉求社区身份认同,或简单的日常生活互约^⑤有其本体性的价值变化。其变化在于,选择者并非一味追求稳定性栖居的静态和谐,而是极致化地追求随机过程中选择取向一致的人生亲证价值最大化,介入时间或长或短的涉身者高度自觉地将在此体验的人生亲证视作必须珍重的缘分,俨然佛教所谓的“有何

① 恩格斯在肯定达尔文进化论的同时,也指出其与马尔萨斯主义混淆的不足,并指出这种不足在于:“(1)由于过度繁殖的压力而发生的选择,在这里也许是最强者首先生存下来,但是最弱者在某些方面也能这样。(2)由于对变化了的环境有较大适应能力而发生的选择,在这里生存下来的,是更能适应这些环境者”。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86页。

② 参阅:“努力追求支配着抉择意志,即使它的承担者可能已经想好了他的所有愿望和目标,并且感觉到这是通过他自由的选择而达成的。”参见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张巍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237页。

③ 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63页。

④ 布莱恩·罗斯比:《经济学的选择过程》,引自库尔特·多普菲编《演出经济学:纲领与范围》,贾根良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40页。

⑤ Ken Reed and Guy Cucumel, “An Analysis of Time Use to Reveal National Differences in Lifestyle Patterns”, in Paul Blyton, Betsy Blunsdom, Ken Reed, Ali Dastmalchian, *Ways of Living: Work, Community and Lifestyle Choic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17.

因缘而造此论? 令善根成熟众生, 于摩诃衍法堪任不退信故”^①, 并且是超越这种生存之困无奈自救之后的生存价值自觉掌控。关键还在于这种自觉掌控现实地发生于世俗社会而非宗教信仰王国, 于是居缘作为社区在场的世俗价值, 使每个随机居住个体竟然会将其作为自我存身价值选择的肯定方式, 甚至会像标尺一样存在于个体与他者日常关联的自审过程之中。此类乌托邦式社区生存状况较之今日“陌生化”“距离感”和“互动参与危机”等尴尬局面相去殊远, 是未来社区生存格局的大概率转型事态。一旦这一转型事态与未来时间线性逐步成为现实, 居民个体与社区的选择关系及其价值生成, 将成为存身义项个体自我评价乃至心理慰藉的核心所在。

传统的超稳邻里关系及其日常诉求的诸如“近邻熟知”与“守望相助”, 及其所有此类诉求在“现代生活节奏”抑或“解构性后现代冷漠”强烈冲击下所出现的衰微, 也就是社区文化治理专家们极为担忧的所谓“导致邻里关系递减弱化的十个方面假设”^②, 至此都可以在对随机选择的居缘价值托重中止损而创建新的活力模式。判断的依据在于, 当随机选择成为个体机会从而具有生存维系价值之际, 社区内任意拼组的邻里关系乃至关系间性的日常事态, 由此就会渐变地实现“固化互限”向“活化互约”的在场结构与行为取向生存论转换。“固化互限”虽然彼此都在对方的长期他者性作用下不断强化其良性自律以维护关系稳定性, 但一方面会因时间绵延压力带来难以承受的厌倦乃至畏惧, 另一方面会因空间窄狭压力带来难以预期的逆反甚至逃避, 由此导致的合力后果, 则要么是不带贬义善意的监视居住, 要么是不可苛责地从一开始就放弃这样的居住关系得以在场生成。从某种意义上说, 当下社区居民之间那些相见如同陌路的楼道邻里, 极大程度上就是这两大原因的直接后果。就现有条件而言, 规避或弱化这样的尴尬, 对社区文化治理专家或者现场运作者而言, 通常的价值主张与实证研究, 基本上聚焦于扩大社区文化活动机会平台以助推居民“参与率”尽可能提高, 从而能在紧密邻里和松散邻里之间逐步建立互信并且互动的稳定关系。所以就有“预案处置”的所谓“获取完整规划的核心功能框架, 使其充满想象力、预期后果、测值和目标, 以将这样的框架呈现为富有活力的各种活动, 从而让所在社区追随响应”^③, 抑或“现场处置”的诸如“他们极为广泛活动的具体目的, 通常为了集中致力于观众扩容, 瞄准具体的人群, 如青年人, 以及社区邻里的其他居民”^④, 但尽管涉事各方均作出了种种力所能及的努力, 而实际效果对“努力者”或“被努力者”而言, 较大程度上都是事与愿违。

从 21 世纪初“网络社区”虚拟现实生成以来, 人们逐渐窥视到某些去陌生化之后生存主体缝合间的生存依偎端倪, 而且在“建构性后现代”对“解构性后现代”从当下延伸至未来的替代预期中, 这种端倪越来越具有放大、凸显和深度化的存在趋势。按照这一演化逻辑, 在可预见的未来, 无论实体社区、虚拟社区还是线上线下融存社区, 居民之间都会因此形成生存依偎的强烈互约动机, 而且这种动机是较少外在干预下的内驱动力行为意向。正因为如此, 诉求生存依偎的此种心理动力, 除了可以从向量心理学意义上描述“生活空间内‘可能’事件”^⑤之外, 还可以从身体社会学角度通过诸如“眼神的仪式化”^⑥来获得祈求程度的测值成果, 而在社区文化治理现场, 无论是向量心理学涉及的“心理动力功能”还是身体社会学涉及的“心理动力症候”, 或者其他诸多未曾求证的关联命题与有效言说, 说到底

① 《大乘起信论》, 梁真谛译, 引自高振农《大乘起信论校释》,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年, 第 6 页。

② Merle Zwiers Gideon Bolt, Movarten Van Han and Ronald Van Kenpen,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Neighborhood Decline”, in Ronald Van Kempfen, Gideon Bolt and Movarten Van Ham, *Neighborhood Decline*, London: Routledge, 2018, p.14.

③ Tom Borrup, *The Creative Community Builder's Handbook: How to Transform Communities Using Local Assets, Art, and Culture*, Saint Paul: Fieldstone Alliance, 2006, p.204.

④ David Karraker and Diane Grams, “Partnering with Purpose”, in Diane Grams and Betty Farrell, *Entering Cultural Communities: Diversity and Change in the Nonprofit Arts*, Rutgers: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8, p.92.

⑤ 库尔特·勒温:《拓扑心理学原理》, 竺培梁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第 203 页。

⑥ 大卫·勒布雷东:《日常激情》, 白睿等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年, 第 177 页。

不过是居民之间具有“互约生成”的心理同构与行为一致。进一步追问则在于,竞争日趋激烈的外部社会环境,以其普遍的自卫性冷漠与他者化陌生,导致居民个体自我肯定其存身选择机会的同时,也不得不把这种选择能量转换为对微观社区空间及其邻里关系的日常生活虔敬,并且托付给某些精神生活祈愿向往,于是互约就不断地从被动走向主动,从消极走向积极,从少数走向多数,从偶然走向必然。彼此互约居缘,将成为未来所有社区存在体普遍化的日常生活呈现形态。

当无数的“彼此”互约汇聚为边界内日常生活主流时,“群体”一致就成为社区生存活性与生活质量可持续支撑的杠杆要素,进而“居缘”就整体性而且本体性地抬升为具有庇护功能的社区共同体核心价值或根本维系。这种抬升较之当下状态的诸如“促进在地和区域发展以增加居民们的幸福,乃是社区幸福之议兴趣持续走强的原因”^①,或者较之已然可喜成果的所谓“社会化和地方性参与的艺术家们由此成为参与率的坚定保障者,并且在为居民提供彼此学习机会的同时,也努力组织起来致力于政府改善其政策”^②,至少就行为属性而言,可以肯定完全不在同一评价体系。其超越性深刻地体现在,一切功能性治理方式或者操作性工具作业程序,都是以外部干预的力学向量寻求干预者的动机能够实现效果最大化,而这就意味着任何效果都不过是“他者”性的预设,或许能与居民自我预期相吻合,但更多情况下一定是强制性抑或附和性的一厢情愿,最终有可能演绎为事态后果的游戏化乃至一场闹剧。但居缘无论作为社会的普在价值本体还是作为社会现场的一种文化形态,对社区所有居民而言,无疑是强化凝聚力并助推驱动力的维系所在,其维系功能不仅可以吸纳外在良性干预能量并将其转化为社会建构力,而且能够在去干预化条件下有效生成庇护居民日常生活的文化张力,并且所有这些积极后果的动力源不过在于,“居缘”在经历个体“选择”的机会肯定并抵达居民彼此间的内驱“互约”之后,就在“群体”一致状态下凝结为能量漫溢不竭并且集体无意识自在自为的社区目标,兼具文化维系功能、文化导向功能和文化促发功能的本体价值实在。正是由于这一价值实在,社区文化激活的一切可能性始终都将处在开放性状态。

居民个体随机进入社区,这种开放性就会在群体一致诉求而非群体认同诉求中赋予机会,而个体选择的要点就在于对“赋予”的正能量回报及其对“机会”的肯定性嵌位,否则就会在准入之后不得不自行返身退出通道。居缘由此也就作为特定社会的一致价值目标,以向量驱动力和能量凝聚力,确保社区随机能动性、动态均衡性、日常凝聚性以及参与可及性等存身要素充分恰配,并且唯有这些恰配对居缘价值的社区坚守,才使社区作为能够生存托付的边界命运共同体具有可能。无论先行社区治理国家还是后发社区治理国家,传统治理方式要么体现为空间社会功能优化,要么体现为属地行政资源配置,要么体现为末梢服务方式有效实施,总之未能根本确立社区作为边界命运共同体的存在支撑或者内在文化维系,因而也就遑论这种文化维系的核心价值就是居缘作为共同体成员的群体一致目标。在新型社区构成形态背景下,尤其在可预期与不可预期并存的未来社区存在模式与进入方式变量肯定大于常量的转型状态下,边界命运共同体仪式不仅是居民个体选择的前置条件,而且还必须是居民之间互约依偎的必然结果,由此才有居民群体相依为命抑或活力聚集的社区家园。虽然社区家园会有实体居住功能、虚拟居住功能或者线上线下融合居住功能存在性分异,但面对流动的人、流动的社会以及流动的日常生活方式,任何一种社区家园存在形态都能为居住选择者提供赖以存身的机会,前提是每个选择者都必须在社区家园承诺邻里关系彼此之间的居缘信念与居缘价值坚守,因为居缘此刻直接就是社区家园及其生机活力的灵魂,而且既是群体生存的灵魂也是个体安身的灵魂,否则

① Frantisek Murgas and Michal Klobucnik, “Community Well-being or Quality of Place? A Few Not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Czech Republic”, in Rhonda Phillips, *Community Quality-of-life and Well-being*, New York: Springer, 2017, p.38.

② Jan Cohen-Cruz, “Art and Culture in Neighborhood Ecosystems”, in Max O. Stephenson Jr. And Scott Tate A., *Arts and Community Change: Exploring Cultural Development Policies, Practices, and Dilemmas*,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55.

就只有因“无缘”而失去居所的放逐与漂泊。

二、居缘的时间线性分析

在如上所涉的义项分述之外,这一议题的复杂性在于,从逻辑理性和历史理性不同角度审视其合法性,则居缘一方面只有在未来社区形态才具有支配性地位,另一方面则又与社区存在史乃至人类居住史几乎都具有同源流轨迹的隐存关系。就第二方面而论,斐迪南·滕尼斯关于共同体类型描述的一般言说,同血缘共同体关联着的是人们的共同关系以及共同地参与事物,总的来说,就是对人类本质自身的拥有。同样地,地缘共同体建立在对土地和耕地占有的基础上,精神共同体的本质则关联着神圣的场所或者受到崇拜的神祇^①,其立论动机在于揭蔽社会生活形而上的人类居住历史,无论血缘亲属关系、地缘邻里关系还是精神友谊关系,全都蕴含着存身居住方式在这些共同体类型生存论叙事之中,从而也就不同程度地蕴含着被动抑或主动的居缘价值意识在整个进程的居住细节之中。恩格斯明确指出,“氏族制度的前提,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成员共同生活在纯粹由他们居住的同—地区中。这种情况早已经不存在了。氏族和部落到处都杂居在一起,到处都有奴隶、被保护民和外地人在公民中间居住着。直到野蛮时代中期才达到的定居状态,由于居住受商业活动、职业变换和土地所有权转让的影响而变动不定,所以市场遭到破坏”^②。实际上这种细节就已经被放大到命题整体的知识位置,同时也意味着地缘居住对血缘居住的权重比变化,在共同体演化进程中有其明显的标志物意义,尽管此议并未涉及滕尼斯编序方案中的精神友谊关系,或许因为生存权重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阈,其权重远未达到与前二者相提并论的历史存在价值。事实上,社会学或者政治学知识域中“血缘”或者“地缘”,其所指范围与意义定位从来就与我们此议所谓“居缘”不在同一叙议维度,至多只是在居住史或者居住方式的具体语境,三者之间才会出现不乏复杂之处的并列关系、递进关系、兼容关系乃至迭代关系。问题是,一旦所议处于这样的具体语境,就可以引申出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纽带的居住方式、以地缘关系为核心纽带的居住方式和以居缘关系为核心纽带的居住方式,而这种引申显然就已遁逸于社会形态学说宏大叙事现场,继而也就在宏观语指遁逸中衍生出具议现场的微观语用。恰恰就在这一微观语用维度,居住方式的历史线性,就不仅体现为存在的源流同步和居缘隐存的延展渐进态势,而且还将未来性地呈现为生存论意义上,以居缘关系为核心纽带的居住方式会在某个时域实现对前者的超越和替代,尽管这同样并不意味前二者在超越和替代之后会出现隐存消失。也就是说,此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居住方式及其社会症候的诸如“几个部落各自独占一块领土而其领土互相邻接,于是他们便以同宗氏族为基础”^③,抑或“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居住方式及其文化表征的所谓‘地点、位置和方向这些元素在村居印第安人的世界观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④,总之趋重族强而居的“血缘”居住方式以及趋重地旺而居的“地缘”居住方式,至此都将在趋重人和而居的“居缘”居住方式和超越替代进程中,退隐至非支配性隐存地位。

而就第一个方面而论,作为逆向讨论的人类居住史革命性转折,实际上是此前进程既始料不及又不可抗拒的演化后果。这一后果将来无论发生在实体社区、网络社区抑或线上线下融合社区,我们都无法站在今天的位置精准预测其完整生存状态或预期可能性,因为今天的社区虽然已经不受血缘居住方式和地缘居住方式的存在性支配,但却依然只是现代城市行政治理与居住资源商业化配置的过渡性生存格局,其格局维系不过是身份、财富和权力之间的博弈现场,而且在博弈完成之后依然呈现

①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张巍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87页。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4页。

③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杨东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21页。

④ 段义孚:《恋地情节》,志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19页。

为趋稳乃至超稳的“定居”状态,并且与传统意义上的血缘性定居或地缘性定居相比,不过时长之别和变动系数增大而已,当然还包括异变存在性的社区之居几乎无缘可言。正因为如此,无论先行社区治理国家还是后发社区治理国家,也不管社区形态在工业时代晚期的曾经衰落还是信息时代初期的重新崛起,到目前为止,不以为“缘”的社区治理在不同体制形态下都还停留在社会静力学观察系的治理阶段,其中日渐扩容的居住变量依然纳入居住常量功能测值框架之中,治理者对社区激活的想象力不过是“涂脂抹粉”的外在功能介入。寄希望于“公共空间为人们相遇和繁杂的邻里彼此认识提供机会”^①,甚至寄希望于在地习俗文化支撑的“各种仪式文化仪式活动都带来现场体验激活,而活动本身尤其具有生活通道功能”^②,虽然在目前社区治理模式下,仍不失为以文化凝聚与耦合消除边际内生存缝隙的有效途径,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其功能有效性正在呈现衰减之势,且衰减的内在理由恰恰在于社区居住三种形态都在发生本体性变迁,价值指向清晰地朝着居缘为纽带的居住方式转变。

于是我们在如上两个方面的讨论之后,有必要离开事态现场,到形而上界面先行明瞭“居缘”之“缘”在此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必然存在,而这种明瞭较之此前编序三个义项并给予生存论敞开是另外一回事,或者说唯有本体揭蔽才使那些生存敞开获得可以理解的源始理由。如果说佛家讲因缘不过是对先天宿命或者后天印证的超验存在关系条件性给定与非条件性转化后果的话,那么极端个案如“慧能闻说,宿业有缘,便即辞亲,往黄梅凭墓山,礼拜五祖弘忍和尚”^③,也依然表现为因缘关系生成情境中个体的被动性,因而也就表现为“十二因缘”所谓“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对一切个体而言,皆不过依顺后受及不定受业,并如《俱舍论》议及“分别世间”之际偈颂的“此一业引故,如当本有形,本有谓死前,居生刹那后”^④,均牵挂于可以多维但必有一维的因缘维系中由胎生而至老死,其积极意义不过在于强调因果决定论与因果关系复杂构成论。这当然是上古人类生存智慧的一种因缘观解困方案,而在时间线性轨迹上,现代因缘观解困方案的典型代表则可以举证现象学的此议知识讨论,且尤其可以引述海德格尔的“结缘在存在着状态上意味着:在某种实体繁忙活动中让一个上到手头的东西像它现在所是的那个样子存在,让它因此能像那个样子存在……从存在论上加以领会的结缘就是:先行把存在者向其周围世界之内的手上状态开放。因缘的‘何所因’是从结缘‘何所缘’方面开放出来的”^⑤。后者知识命题异质性在于,它在从此前佛教精神旨趣的神学知识域向形而上思想追问的世俗知识域转化过程中,实现了“先在本体因果”向“此在生存因果”的所议转向,而这种转向的积极价值恰恰在于,使涉身者能从信仰的被动宿命状态获得主体解放,并且在获得解放后能够在追求自身意义建构的同时也追求世界意义的建构,从而确立日常生存界面自我之为自我以及世界之为世界,而落实到社区现场,则或许可以表述为社区日常之为社区日常,所以这种转换和递进的价值自不待言。

问题在于,即使海德格尔“此在生存因果”命题引入社区生存之议,也依然不过是与主体能动性无涉的客体生成过程抑或对象性生存真相,具身至社区日常生活现场丝毫不意味着主体能量充分释放和社区潜能有效激活,所以也就如佛学因缘持论一样,依然难以实现社区和居民在互动选择中互约新型社区生活方式与社区动力机制的生机迸发态日常栖居格局,而这恰恰就为居缘价值命题及其所裹挟的社区生活方式由渐进出场而至支配性地位提供了必然前置条件。虽然居缘价值命题作为一种社区文化治理具体命题,其因缘诉求与一般意义上的佛教因缘观和智者因缘观并非完全异质抑或无条

① Tom Borrup, *The Creative Community Builder's Handbook: How to Transport Communities Using Local Assets, Art and Culture*, Saint Paul: Fieldstone Alliance, 2006, p.175.

② Roger D. Abrahams, *Everyday Life: A Poetics of Vernacular Practic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5, Philadelphia, p.154.

③ 慧能:《坛经》,引自潘桂明《坛经全译》,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第142页。

④ 世亲菩萨:《俱舍论颂·分别世间品》。引自智敏上师《俱舍论颂疏集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347页。

⑤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04页。

件排斥,但其实它的超越性如同对“血缘”和“地缘”的支配性居住方式和未来指向超越,乃是人类生存时空变幻在社区生存方式演进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超越处在于,在一种新的世俗生存界面文化价值导向下,居民不是听从居住的命运摆布而是自觉追求邻里间的恰配性,居缘由此成为存身者的文化向量最大诉求与文化信念现实张力,而在这种不乏神学因缘意蕴与哲学因缘意蕴隐存其中的居缘价值状态下,其所体现的存在价值就远不止于“个体与他者或者他们的生存环境融汇相生”^①,而更在于个体在主体性价值充分发挥与居住自由意志活动主观中,使得社区能在变量系数持续增大及动态重组随机变化的不确定性背景下,建构起“持稳”而非“超稳”的文化维系命运共同体,一种所有个体都能把幸福缰绳握在自己手里而后在间性文化基础上求取居缘文化价值的缩微世界,并且覆盖着实体社区世界缩微、虚拟社区世界缩微和线上线下融合社区世界缩微。

三、居缘的生存论条件给定

在清晰理解居缘文化愈来愈成为由现在走向未来的支配性居住方式的必然趋势与可能状态之后,紧接而来的问题就是,究竟哪种社会因素变化使得这样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势不可挡?就我们当前所能意识到的现实性与未来性存在史深度而言,或许以如下四个方面为最:(1)“间性文化”需要社区“凝聚”而非“集会”。(2)流动社会倒逼人际“亲近化”而非“陌生化”。(3)数据时代确保居民“随机择邻”而非“恒定相邻”。(4)智能生活敞开居缘的“无限世界意蕴”而非“有限物质沉沦”。

无论生存于实体社区、网络社区抑或线上线下融合社区,甚至无论肉身人身份、赛博人身份以及混杂人身份,当他们相遇于特定社区并展开其日常存身与日常交往行为,其所呈现的边际内文化生成后果必然是间性文化日渐凸显的未来向量趋势。导致这一后果的最直接原因在于,每个涉身者愈是居住自觉就愈具个体在社区情景内的主体性建构效果,因而也就愈具彼此间的间性关系,由此也就在“时效”和“场景”合力驱动下衍生愈来愈浓的“间性文化”,一种群体间个体自在自为最大化的在场分隔文化状态。而这显然与社会文化治理价值导向严重背离,甚至它直接就是社会文化治理合法性的核心依据所在。如果按照传统治理思路,显然就会首选动员参与并由此产生不同热闹场面与狂欢方式的“集合”,但这种在场参与集合未必能形成激励机制,并不能改善和促进不同社会形态的所在场域分隔的现场困境,因而也就倒逼社会文化治理者与参与者,如何在“凝聚”的心向往之之中自恰而且互恰,最终因凝聚力量对间性文化的缝合与粘接效果而使整体性的多元文化社区,或者满足个体不同心理诉求的生机勃勃社会文化,得以边际条件整体地构建起在场日常生活激情抑或精神诗意栖居沉浸式体验。体现在网络社区生活空间,约翰·R·苏勒尔经验性地将这种构建描述为“我们最初大约有40个成员组成的小社区凝聚在一起。我们使用虚拟化身愉悦表达自我,利用Palace的视觉特征组织社区活动,建立新房屋,分享我们在线和离线的的生活体验,在这些过程中我们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这是使他们感觉像是共同开创新天地的开拓者。Palace的老用户后来把这个时期称为‘过去的美好时光’”^②。诸如此类的当下偶在体验与未来普遍体验,从生存论维度而言,意味着“间性文化”对日常社会的价值悖论,使得置身其中的人们不得不拥趸其个体主体性充分张扬的同时,解困其个体在场分离并努力实现最大和解,否则就可能因极端间性文化,更大规模地孕育极端生存甚或极端主义者,而社区居缘文化日常生活家园,或许就是各种有效解困的微观社会应力场之所在。在这里,人们因居缘价值观实现而生活得心平气和,减少暴戾乖张。

^① Betay Blunsdom, Ken Reed, Paul Blyton and Ali Dastmalchian, “Social Change and Ways of Living: An Introduction”, in Paul Blyton, Betsy Blunsdon, Ken Reed, Ali Dastmalchian, *Ways of Living: Work, Community and Lifestyle Choic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3.

^② 约翰·R·苏勒尔:《赛博人:数字时代我们如何思考、行动和社交》,刘淑华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326页。

谁也不曾预料到超稳结构乡土中国乃至现代化进程提速后的城市中国,甚至谁也不会预料以“居者有其屋”作为人生梦想和社会价值理想的中国人,会在建构性后现代因户籍放开、工作变动、行走自由乃至财富产权化交易化等诸多生存杠杆支撑,导致流动社会和流动生活方式不经意间就成为亿万涉身者的具身现实,而这一具身化进程,还在更深层次带来由生存方式变异走向社会本体转型的革命性进展。很显然,在流动社会和流动生活方式的全新背景下,个体此前所倾力诉求并赖以维系的诸如人脉、职业伙伴、日常亲属交往、代际传递的邻里依存结构直至基于血缘地缘等维系所自然形成的边际性变化的认同背景,都有可能在流动性日益强势驱动下被迫部分消解乃至极限态特定个体所遭遇的完全消失。对于那些研究“后社会史”的学者来说,现代社会所孜孜以求的诸多“认同价值指向”,已然于流动中成为难以捕捉把握或者持续稳定的社会静力学分析维度,而且演绎出跟进事态的诸如“认同之所以不稳定,并不只是因为社会条件本身不稳定,而是因为具体事例中使认同趋定的那些话语条件本身也是不稳定的……后社会史并不仅限于将认同历史化,也不限于否认主体的自然限定性,而是进一步,否认其社会限定性”^①。延展至当下中国事态现场,我们不仅要看到他们已看到的由现代社会认同稳定性到后现代社会这种确定性的渐进丢失,而且更要看到人类学视野“人际”关系,无论功能结构还是功能方式,都在渐变过程中不断衍生出非稳而且非清晰的各种“人际类别”或者“人际形态”。生存论的新型人际张力与存在论的新型人际维系,使得日常社会存在方式已经愈来愈面目全非。类似“一般世界状况”,当然会更加细微同时更加深刻地体现在不同的社会形态现场,而这种细微和深刻的社区现场体现,无论居民群体“凝聚”还是居民邻里“互约”,都集中于“陌生化”的充足条件或相反的“亲近化”条件不足。毫无疑问,对任何一个社区而言,人际“陌生化”的直接后果就是文化凝聚力弱化,介入式的外在干预并不能诱引内生凝聚力进而能将文化凝聚弱化不利局面真正解困,更遑论由此而使流动进入社区的居民们在“亲近化”共建其存身家园的社区文化,于是也就意味着凝聚态社区文化缺席之后,社区蜕变为不过是各自寻找其旅社的陌生行者居住空间或在线界面。没有边际交往,没有在场生机,没有日常生活氛围,更没有命运共同体的生存依偎。所有这一切,在要素能量合成至某一临界点之后,就会倒逼出强大的社会建构反弹力,或者新型人际建构反弹力,具体到社区人际建构就会反弹出居缘人际活性抑或动态化人际有效恰配。这种因倒逼而反弹出的人际亲近化,就能确保社会动力学视野期望社区存在形态以及社区日常生活方式得以生成和可持续。在这里,人们因居缘价值实现而生活得身心温暖,减少漂泊孤独。

那些无视历史递进加速度乃至加速度社会后果越深越具有本体颠覆性的人们,甚至那些因迭代社会生存景观而对数据时代全域而且全面算法支撑依旧将信将疑的逆向真实坚守者,一定会将我们对未来社区生存方式及当下社区动能形态之变视为虚张声势的夸饰之辞,因为他们无法相信数据时代的技术理性、技术工具性乃至技术主体性等,能够确保居民可以随机择邻,因为从传统到现代这种随机可选择性从来就不曾动摇过“恒定相邻”的邻里居住关系,当然也同样未曾危及现代社区因这种邻里关系而长期普遍诉求的社区身份认同这一边际内核心价值观。与他们的看法恰恰相反,汹涌而至并最终具有全称功能覆盖意义的数据时代或者说全面数字化时代,远不能只是工具主义地理解为“大数据技术就是数字时代的‘望远镜’或者‘显微镜’,使我们可以看到并计量之前我们一无所知的新事物”^②,甚至也不能此议之际只是价值肯定其“研究过程数据在协作中的作用后,社区的边界、范围、一致性和非一致性便呼之欲出了”^③,而是超越统计时代样本边际分析的诸如“贝叶斯推断”及其精准计算作出的“在分层模型的情况下,处于高层的单位数(如两层模型中一单位的数量)总是决定是否可

① 米歇尔·卡布雷拉:《后社会史初探》,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8页。

② 史蒂夫·路尔:《大数据主义》,胡小锐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8页。

③ 克莉丝汀·L·伯格曼:《大数据、小数据、无数据:网络世界的学术》,孟小峰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29页。

应用这些大样本性质的关键”^①，并在诸如此类的超越之后全面创建复杂性适应系统并功能匹配全域可及的分类化社会计算模型，其中包括基于社会动力学靶向功能的所谓“自组织临界性与幂率”，也就是“局部作用的集聚形成定义明确的全局模式，如城市、社区以及选举街区……当 $\text{Prob}[X=x]$ 时，一个系统服从幂律分布”^②。毫无疑问，大数据时代居者随机选择之际，其所面对的全域信息覆盖及其覆盖的真实有效，是以使其“择邻”有其可恰配为充分依据的，因为彼此选择抑或群体性参与选择，此时实际上是在信息对称社会平台上的公平博弈与公平求缘，从而都是在博弈性的求缘过程中各自选择自己的栖身之所，并且不是一次可选择而是连续可选择，涉身各方的这种选择过程一直延伸至其所认为满意时为止，同时还为这种满意的误判预留了修正错误的后续机会。所有这一切，皆因数据时代全域而且全息技术平台有效支撑而成为可能，而其居缘支撑意义，则在于“随机择邻”对“恒定相邻”社区栖居方式置换中，不仅使人的存身自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主体性张扬，而且将能极大地规避被动生存中相邻“陌生化”“防范心理”“毗居而仇”而竟难以解脱的日常之困，由此而因技术杠杆较大程度做到“我想住哪我做主”。在这里，人们因居缘价值实现而生活得其乐融融，减少日常纷争。

我们必须看到数据时代是智能时代得以存在的基石却并非智能时代社会本体，甚至我们必须深刻地意识到智能时代所带来的智能生活方式远非我们当前所见抑或想象力所及的任何细节性便利，而是技术主体性碾压技术理性之后人类主体性的本体价值融合、存在功能叠加以及生存方式嵌位。从前那些关于两者之间关系的延伸性分析或者间性分析，大概率事态评估当是非对位后果的解读无效，因为由此衍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单向度叙述亢奋抑或人类危机意识意向叙事焦虑，实际上都与智能时代作为“后人类时代”开启阶段的内在真相相去殊远。对于智能时代，无论一味乐观的“自古以来，我们一直希望自己的后代超越自己，如果‘强人工智能’比我们强，我们庆贺都来不及，还焦虑什么呢”^③，还是一味悲观的“尽管被描绘成乌托邦，但智慧城市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极端短视地把城市等同于技术问题的概念重构。按照这种观念重构城市生活和城市治理的基础，将会导致城市表面上很有智慧，但实质上充满了不公正和不平等。智慧城市可能变为如此之地：自动驾驶汽车在市中心横冲直撞，驱赶行人，公民参与仅限于通过应用程序请求服务，警察使用算法合理化并持续种族主义的执法行为，政府和公司监控公共空间，从而监控人们的行为”^④。这些都还是快速演化现象的情绪反应，俨然停留于笛卡尔的线性逻辑而非薛定谔的弹性变化，于是一个虽露端倪但实际进程依然遥远的可预见与不可预见相叠合的未来，就彼此在基于逆向经验的各种倾向性揣测所全称覆盖，只不过全称肯定与全称否定之别而已。但这一叠合时间未来的问题要义其实应该在于，工具延伸论与工具突变论并非颠覆性社会变迁的最大变量所在，而是一旦技术主体性与人类主体性本体价值叠合或存在功能整合，人类就能从中心主义制高点的忙控之态与乏力之势中得以由超级灵长角色回归到平等生命位置，世界、社会、生存乃至自然的生灭轮转抑或千变万化，就能够在合力生成与共建共享中重新被定义、编序、创造。所谓以智能时代为历史起点的后人类社会史乃至后人类生存直接经验史，不是人类的中介而是解放和新生，这意味着人类进化到后人类之后更有能力将人与对象世界的垂直支配关系转换为扁平化互恰关系，亦如这一切将会首先呈现为社会界面的存在扁平化与生存互约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要倾力思考并且先行谋划的，是如何迎接由我们自身创建却又倍觉始料未及的新文明形态、新社会格局乃至新生活方式。而所拟的最后一个义项，直接就因智能生活的存身先锋性，得以在后人类或者后社会史全面兴起之前，先行以大地孕育的正能量增长方式实现其居缘社区文化的

① 斯蒂芬·W.劳登布什、安东尼·S.布里克：《分层线性模型：应用与数据分析方法》，郭志刚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3页。

② 约翰·米勒、斯科特·佩奇：《复杂适应系统：社会生活计算模型导论》，隆云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92页。

③ 翟振明：《虚拟现实+人工智能：自我与社群的重塑》，引自胡泳等主编《后机器时代》，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209页。

④ 本·格林：《足够智慧的城市：恰当技术与城市未来》，李丽梅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页。

生存敞开。支撑敞开得以实现的技术条件,诸如“人工智能”(AI)、“强人工智能”(AGI)、“大数据”(big data)、“代码”(code)、“物联网”(IoT)、“区块链”(block chain)、“算法”(algorithm)、“数字身份”(digital identity)、“分布式对象通信”(distributed object communication)等等,在更加系列化、妥靠化、全域化之后,定义以社区生活边际目标功能指向如“沉浸”“交互”“识别”“自组织”“仿真拟像”“能指随机所指”“完全替代”“恰配”“症候精准阅读”“自调节”“场域集合效应”“靶向定位”等诸如此类生成原则,则智慧程度不同或者智慧方式差异化的三种社区形态,就都能够在要素恰配基础上生成智慧社区,并且可按层级切分为前智慧社区、初级智慧社区、中级智慧社区和高级智慧社会,进而伴之以居民所能同步享有的智慧生活方式。当然,这必然会是漫长的演化过程,一开始表现为“有限物界沉沦”的外在便利性或器物界面人的充分自由,而这也是当前位置人们对智慧生活方式的主要诉求与最大限度的想象可及性,但随着智性向社区本体和文化界面的深度介入,居缘价值诉求的社区智慧生活就成为无限拓值的场景变化方式与意蕴绽出过程,个体、邻里和社群由此而在社区作为世界的非穷尽意义化中,因智慧时代的托举而得以在智慧社区的智慧生活情境,体验和承享“世界之为世界”的此在“诗意的栖居”。极限态甚或可以看作原始状态且边际闭合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在这里,人们因居缘价值充分实现而生活得自由浪漫,减少囚困压抑。

On Neighborhood as the Internal Maintenance of Community Survival in the Future

Wang Lieshe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P.R.China)

Abstract: Following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the community-and-flat-based social governance, the accelerated change of living style brought by the intelligent society to each intelligent community will show a trend of survival mutation in different daily life interfaces, such as physical community, virtual community and online and offline integrated community. One of its core mutations is that the traditional “fixed neighborhood” is quickly replaced by “random neighborhood selection”, and the internal maintenance of this replacement is that people consciously move towards the pursuit of neighborhood or neighborhood culture, so as to meet the needs of mobile life, mobile society and mobile value pursuit. Therefore, the daily state of the existing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will realize the surviv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higher value mutual agreement. Although we still can't exhaust the marginal meaning of future transformation, we can be sure that it will be a revolutionary turning point of social chang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daily social life style. Therefore, all kinds of positive vector value expectations are very likely to be realized.

Keywords: Living relationship; The culture of living relationship; The change of community form; Big data support; Smart community expectations

[责任编辑:郝云飞]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2页。